

美国动态

(半月刊)

2020年10月20日 (第224期)

内部交流 仅供参考 请勿引用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卡内基呼吁美国为中产阶级制定外交政策

要恢复美国外交政策的可预测性和一致性，就要为其争取广泛的政治支持。而目前争取这种支持的最好也是唯一可行的途径是，让美国外交政策更好地为中产阶级服务。

皮尤分析美国选民在种族和族裔结构上的变化

随着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临近，美国选民的种族和族裔结构变化再次引起关注。过去二十年来，非西语裔白人选民人数下降，而非白人选民人数大幅增加。

中美关系

美智库称美国将 5G 国有化是与中国竞争的错误方式

美国传统基金会网站近日载文称，美国国防部最近要求建立单一、全国性的大规模网络，但这不会为 5G 竞赛带来切实的解决方案，反而将带来更多问题，因为其建立在一种错误的信念之上，即联邦政府能够比私营部门行动更快、更有效

文章称，美国国防部的想法似乎令人钦佩，将建立一个安全的 5G 网络与中国竞争，但实际上忽略了美国私营企业在 5G 领域已经取得的巨大进步。美国私营企业在电信领域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而联邦政府无法雇用足够的网络安全专家来充分保护自己，建立统一的 5G 网络肯定会降低新网络的开发速度，还将增加巨大的不安全风险，因为集中统一的网络系统更脆弱。

文章称，由于目前国防部拥有的部分频谱被共享或出售给了私营部门，五角大楼在此过程中应该确保军队权益得到保护，但不应该主导开发新的 5G 网络。美国国务院、商务部和财政部应该甘当配角，共同努力减少对私营企业的监管和限制，并在海外保护美国的企业。

美助理司法部长德莫斯谈及美国如何应对中国影响

当地时间 10 月 7 日，美国司法部助理部长约翰·德莫斯（John Demers）在哈德逊研究所参与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对话。

德莫斯称，美司法部国家安全司是一个较新的部门，近年来的工作有三大重点：一是继续以整合为主要任务；二是重点从反恐转为关注民族国家的活动，而中国是重中之重；三是对网络成

为民族国家投射力量的新兴手段予以重视。

德莫斯是“中国行动计划”（Chinese initiative）的领头人。他宣称，建立“中国行动计划”是因为中国盗窃知识产权的情况严重，美国 80% 的经济间谍和 60% 的商业秘密纠纷都与美国有关，而这些经济间谍案件因为发生频率低，往往未引起美国各地检察官办公室的重视。此外，“中国行动计划”帮助检察官办公室获取非机密简报，有助于其与私营部门和学术界的合作。

德莫斯还提及中国的“影响力行动”。他宣称，尽管孔子学院是教育项目，但其教学内容带有政治色彩。他还称，中国不仅在联邦层面，而且在州和地方层面建立联系，寻找在政治上有前途的个人和在华盛顿有影响力的人以支持中国的政策重点。德莫斯称，美国正越来越关注中国对海外中国学生的“监控”，且进一步要求学者向美国资助机构报告其研究的国外资金来源，尤其是从中国“千人计划”获得的资金。

此外，德莫斯还称，中国和俄罗斯的恶意“影响力行动”颇为相似，但并不意味着这些活动是协调合作完成的。例如，俄罗斯未出现类似中国的知识产权盗窃行为，俄知识产权盗窃行为更多集中在军事和两用设备上，而中国更关注商业方面。

美学者称需要重视中国的经济补贴问题

美国企业研究所专家史剑道（Derek Scissors）近日撰文称，美国应重视中国的经济补贴问题。

史剑道称，美国在国内财富、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份额等一系列重要经济指标上仍然大幅领先于中国，且由于中国正在迅速老龄化，大多数差距不太可能缩小。因此，政策制定者无需担心中国成为全球经济领导者，而应关注有害的中国行为，尤其是补贴

问题。为此，史剑道向美国决策者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步是将紧盯问题最严重的地方。最严重的问题不是双边贸易逆差和操纵货币，而是中国对国有企业的补贴。美国的比较优势是在农业和创新方面，而中国购买美国的农场产品，窃取美国的创新，最终将应该是美国出口的东西变成中国的出口。

第二步是做好文字记录，国有企业的普遍性、对竞争的影响、对国企限制的缺失这些应当被记录在案，知识产权委员会对损失的估计应按具体细目和国别更新。美国司法部已扩大了其在中国的知识产权调查范围，这将使对盗窃成本的估计变得更加容易。

第三步是执行美国法律。司法部档案中有几十起中国经济间谍案，这些案例具有极大破坏性。应当禁止从知识产权窃取中获利的企业与美国人和美企进行生意往来。美国目前还没有充分对中国的产品实施反倾销政策，实施相关措施将胜过征收关税。

最后，美国应当援引对等原则，关闭一些对中国的市场。美国不应当参与和中国的“补贴竞赛”，但应当惩罚和不鼓励补贴。目前，中国“胁迫性的”知识产权转让带来的损失比盗用知识产权更难以评估。

美国应避免与中国发生军事事故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近日载文称，避免发生军事事故，是美中两国最为重要的共同利益，这需要双方领导层和外交官彼此倾听而非说教。文章摘要如下：

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以及由共和党领导的中国特别工作组近期发布的两份报告表明，美国外交政策界对中国崛起的看法是多么严肃。这两份文件都将中国描绘成“危险、邪恶”力量，认为除非美国动用资源阻止，否则中国对全球主导地位的追

求将不受挑战。当下美中从贸易、技术到网络间谍和地缘政治等各领域，都处于冲突升级周期之中。双方都认为，自己站在正确的一边，并且有责任阻止对方以免失去优势。

台湾问题是美中竞争中一个特别危险的议题，最近蔡英文当局有意深化与华盛顿的“战略伙伴关系”（美国国会绝大多数议员也非常支持这种关系），其行为越发大胆起来。特朗普政府已经向台湾出售了 150 亿美元的军事装备，并准备签署另外 70 亿美元的一揽子协议。北京并未任由事态发展，也做出了回应。

在目前的背景下，有中国问题专家建议下届总统重新设定双边关系，而包括特朗普总统在内的一些人甚至想与中国“完全脱钩”。然而，美国现在需要做的并非重启两国关系，而是对中国的挑战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中国现在在做历史上任何崛起大国都在做的事情，即利用经济增长实现军事现代化，与邻国和对手拉开距离。相较于军事征服和全球霸权，中国战略更多是将自己打造为全球性力量。

美中短期内恢复友好关系的可能性极小，但完全有可能在具体问题上出现小幅缓和。双方可以共同解决的问题有很多，例如新冠疫情、恐怖主义、维护全球市场稳定和双边贸易关系，但最重要的是避免出现军事事故，以免事态激化成冲突。

对华强硬现在是华盛顿的一种“时尚”，但将美国的对华政策变成一劳永逸的模式是一种情绪上的反应，可能会对未来几十年的中美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CSIS：在民调基础上制定美对华政策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网站 10 月 14 日载文，公布了有关中国问题的最新民调结果，并在此基础上为美国下届

政府的对华政策提出建议。

本次调查的访问对象主要是美国公众和美国、欧洲、亚洲的意见领袖，涉及的议题包括贸易、安全、人权和中美关系。主要调查结果如下：

多数受访美国公众对中国持负面看法，54%的人认为中国给美国带来了最严峻的挑战，仅 18.6% 的美国公众、4.1% 的美国意见领袖认为与中国合作是优先事项。美国公众各年龄段中对华持正面态度比例最高的是 18-30 岁群体。另外，共和党人对中国看法比民主党人更加消极。

美国、欧洲和亚洲意见领袖认为，中国作为国家安全问题，最佳应对之策是志同道合的国家间开展合作。相较于美国公众（44.7%），绝大多数美国、欧洲和亚洲意见领袖认为，盟友和伙伴间开展合作是优先事项。不过，仅 1.8% 的美国意见领袖和 4.9% 的盟国意见领袖支持美国进一步提升军力，且东南亚和欧洲部分地区的受访者希望与美国开展国际合作的同时，保持自身的中立立场。

科技竞争是最大的关切。超过三分之二的美国、亚洲、欧洲意见领袖支持禁止华为和其他中国高科技公司进入本国市场。这一比例在韩国、日本和台湾地区达到了八成左右。

多数人认为特朗普的对华经济政策得不偿失。美国 71% 的意见领袖和 42% 的公众认为，特朗普发起贸易战损害了美国的经济利益，且并未让中国做出积极改变。约三分之二的美国、亚洲和欧洲意见领袖，以及 35% 的美国公众认为，对华经济政策的重点应该是利用多边协议向北京施压，要求其遵守承诺或改变政策。

多数美国人准备承担相当大的风险，以保护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免受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六成美国民众认为中美有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但可能性不大，只有 11% 的人认为冲突不可避

免。美国的盟友们对美国准备冒重大风险保护自身免受中国军事威胁仍有信心。假设中美此时在西太平洋开战，79%的美国军事专家和84%的盟国专家认为美国会赢，但认为十年后能获胜的比例下降至一半左右。

最后，文章为美国的对华政策提出几点建议：美政府必须阐明对华政策的清晰、可实现的目标，并设计实现这些目标的战略；在中国问题上形成多层次和灵活的国际联盟；与中国展开技术竞争时，加强联盟间的协调，优先与日韩和台湾地区形成环太平洋数字贸易协定，加大高科技产业的竞争力度和投入，但不支持切断产业链；避免把美国的研究、创新和教育交流置于不必要的风险之中；在西太平洋恢复威慑，强化与盟国的共同决策和军事指挥；组成国际联盟来协调人权政策；在符合美国利益的全球议题上开展合作；就对华战略在美国国内进行全国性对话；继续与中国开展战略对话。

美国外交

美前外交官称美军不应提早从阿富汗撤军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网站近期登载坎宁安(James Cunningham)等数位前美国驻阿富汗大使的联名文章称，特朗普近期表示美军将在圣诞节前从阿富汗全部撤出，此举将带来灾难性后果。

文章称，特朗普10月7日在推特上表示，美军将在圣诞节前从阿富汗全部撤出，如果消息属实，这将使阿富汗局势向塔利班倾斜，不仅会对阿富汗造成威胁，还会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并使美国在保证塔利班信守承诺方面的影响力减弱。

文章称，美国与塔利班的协议是有条件的，塔利班要遵守诚

信和协议条款保护美军和盟军在阿富汗安全，美军才会撤出阿富汗。但特朗普的推文意味着美军的撤军进程加速了，这意味着现任政府放弃了美国两年来与塔利班、盟友伙伴达成的外交协议。

文章写道，在多哈的阿富汗谈判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结果前，加速撤军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减少暴力是美国与塔利班协议中的关键，但塔利班迄今仍无视这一承诺，事实上，一旦美国及其盟友离开阿富汗，塔利班很可能会进一步加强其军事行动。美国需要让阿富汗人重回谈判桌，让塔利班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成为一个更负责的角色。

约瑟夫·奈：“新冠疫情”可能不会改变世界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近日登载哈佛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的文章称，那些认为新冠疫情会终结全球化、扼杀自由民主、增强中国软实力的想法是不正确的，必须消除当前流行的四个迷思。

第一，疫情会成为历史转折点。新冠疫情固然是个大事件，但它并不一定引起地缘政治变化。疫情对美国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了深远影响，加剧了美国的不平等现象。如果这些社会变化加深了政治极化或混乱，可能会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或地缘政治，但也可能触发国内政治改革而不改变外交政策。

第二，新冠疫情意味着全球化时代的终结。全球化和相互依存也许会受影响，但不太可能停止。经济全球化的某些方面，如贸易可能会受到限制，而其他方面，如资金流动则可能不会受限。而且，区分经济全球化和生态全球化有重要意义。经济全球化受政府法律的影响，而全球化生态方面，如气候变化更多是由物理规律决定的。新冠疫情对社会全球化的影响也不清楚。一些与国

家安全相关的经济供应链可能会更加区域化，但这些调整不太可能中断所有的全球供应链和贸易。

第三，新冠疫情意味着自由民主制度终结和威权政治崛起。疫情期间，一些非自由主义的民粹主义者强化了威权控制，一些新兴经济体也出现了民主化倒退，但这两种趋势在疫情暴发之前就形成了。疫情可能只是加强了这些趋势。

第四，新冠疫情使中国在软实力方面较美国具有长期优势。事实上，中国软实力排名在全球将长期处于较低位置。民调显示，自 2017 年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的软实力已经在下降，而应对新冠疫情不力无疑将进一步推动下降趋势。不过，历史上美国的软实力曾成功恢复，比如在越战后的几十年。

奈总结称，在地缘政治中，大事件并不总是会产生大影响。

卡内基呼吁美国为中产阶级制定外交政策

要恢复美国外交政策的可预测性和一致性，就要为其争取广泛的政治支持。而目前争取这种支持的最好也是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让美国外交政策更好地为中产阶级服务。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网站近期发布报告称，中产阶级是美国力量的一个关键支柱，为了帮助扩大和维持美国的中产阶级，美国政策制定者需要将外交政策更好地纳入国家政策议程，提高经济和社会流动性，重建国内外信任。

为了研究如何制定为处于危机中的中产阶级提供支持的外交政策，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设立了一个美国外交政策特别工作组。本报告是两年工作、数百次采访以及对美国中心地带三州（科罗拉多州、内布拉斯加州和俄亥俄州）经济进行深入分析的

总结。报告提出五条建议：

第一，将政策辩论的范围扩大到贸易之外。制造业一直是没有大学文凭的人通往中产阶级的最佳途径之一，支撑着美国各地的地方经济，特别是在工业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因此，很多关于美国中产阶级复兴的辩论都围绕贸易政策对制造业工人的影响展开。然而，尽管美国失去了数百万制造业工作岗位，全球贸易之外的其他经济力量也在这种衰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如今大多数美国家庭在制造业以外的领域工作，维持着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其中许多人普遍支持美国过去几十年的贸易政策。

第二，解决对外经济政策的分配效应。要使全球化有利于美国中产阶级，就需要对美国各地的社区进行大量投资，并制定帮助各行业和地区适应经济动荡的全面计划。具体而言，外交经济政策需要：优先考虑能够创造就业机会和恢复收入的国际政策；修改美国的国际贸易议程，确保它与国内政策议程相配合，以支持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增长；使美国和国际贸易执法工具和机制现代化，以更好地打击对中小企业和工人尤其有害的不公平外贸做法；争取达成其他国际协议，缩小各国之间的监管和治理差距，以改善责任分担，帮助解决公平问题；制定国家竞争力战略，努力提高美国中小企业和工人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提高社区吸引能创造就业机会的商业投资的能力。

第三，打破国内政策与外交政策相互孤立的状态。国家安全战略家和外交政策规划者在很大程度上站在安全和地缘政治竞争的角度阐明国家利益并确定美国政策的方向。这仍然是一种至关重要的角度，但考虑到现在很多美国人难以维持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需要用更宏观的视角看待国家长期繁荣和中产阶级安全面临的威胁，对国内经济和社会问题以及这些问题与外交政策决策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有更深入的理解。

第四，摒弃美国外交政策中陈腐的组织原则。一个更能与中产阶级家庭产生共鸣并促进他们福祉的外交政策议程应该：重振与亲密盟友的关系，建立一个灵活而有凝聚力的网络，有效应对外交、经济和安全方面的挑战，保障中产阶级的安全和繁荣；管理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以降低冲突风险；降低数字危机的威胁，促进开放和健康的数字生态系统；加强战略预警系统和情报支持，以更好地防范代价高昂的冲击，并加强国内保护系统；将部分国防支出转向研发和技术人力开发，以保护美国的创新优势，增强长期准备；加强经济调整计划，提高中产阶级社区对经济活动方式变化的适应能力；保护关键供应链，增强经济安全。

第五，围绕有利于美国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建立新的政治共识。无论是冷战后的自由国际主义，特朗普总统的“美国优先”，还是进步派对经济和社会正义、气候变化以及削减美国国防开支的强调，这些都无法对美国中产阶级的复兴起到关键作用。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没有一种观点能得到两党广泛的支持。事实上，尽管中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存在差异，但他们的外交政策偏好指向了一种潜在的新外交政策共识，但这种共识尚未在当今高度两极化的政治阶层中得到反映。

总之，要恢复美国外交政策的可预测性和一致性，就要为其争取广泛的政治支持。而目前争取这种支持的最好也是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让美国的外交政策更好地为中产阶级服务。

美国政治/其他

民主党在关键州选民登记方面的优势缩小

《华盛顿观察家报》网站近期载文称，相较于共和党，民主

党在关键战场州选民登记方面的领先优势正在缩小，特朗普竞选团队将之视为隐性优势。

自 2016 年选举日以来，在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在登记选民方面相较于共和党的优势减少了近 20 万人；在北卡罗莱纳州，民主党的优势减少了 24.3 万人；在佛罗里达州，民主党的优势减少了 15.4 万人；在艾奥瓦州，共和党从 3 月 1 日比民主党少近 1.5 万选民登记，变为领先 1.3 万。

特朗普竞选团队对疫情背景下动员选民登记的结果感到振奋，称这些工作将使特朗普连任。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工作人员查理·杰罗(Charlie Gerow)表示，共和党登记人数的巨大改善与选民对特朗普的热情直接有关，“许多人是新登记的，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专门因为唐纳德·特朗普而登记为共和党人”。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发言人大卫·伯格斯坦(David Bergstein)则表示，民主党在关键战场州的登记选民也在增加。例如，民主党现在在亚利桑那州皮马县(Pima County)拥有 11% 的选民登记优势，皮马县是该州人口第二多的县。民主党人还强调，该党在邮寄投票和提前、亲自投票中享有显著优势。

特朗普在美老年人中的支持率下降

“政客”网站 10 月 8 日载文称，2016 年的出口民调显示，52% 的 65 岁及以上的选民支持特朗普，而 CNN 日前展开的一项民调显示，特朗普在该年龄段选民中的支持率为 39%，而拜登的支持率为 60%。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是特朗普应对新冠疫情不力。

目前，美国每天有 1 万人年满 65 岁，56 岁至 73 岁的“婴儿潮”一代占据人口比例较大。一般而言，人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越发保守，自 2000 年之后，65 岁及以上的选民给民主党总

统候选人投票比例很低。特朗普赢得 2016 年大选，在老年人群体获得较高的得票率。

然而，在本次选举周期中，两件事或将改变上述趋势：第一，在传统价值观和财产责任方面，特朗普不符合大多数保守派的理念；第二，应对新冠疫情不力。老年人最关注新冠疫情，因为他们所面临的风险最高，病情和死亡率随年龄增大而加重，他们迫切希望领导人能解决当前的疫情危机。

拜登团队在特朗普的“地盘”加大电视广告投入

“政客”网站近期载文称，拜登正加大对传统“红州”以及特朗普 2016 年胜选的州的电视广告投入。

拜登 11 月将花 620 万美元在得克萨斯州打广告，这是几十年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第一次试图让该州发挥作用。有民调数据显示，特朗普在该州的支持率仅领先 2 到 3 个百分点。拜登及其盟友还在让特朗普 2016 年胜选的关键战场州获得广告优势。在大多数竞选活动媒体市场中，拜登的广告花费超过了特朗普。

特朗普在电视方面没有钱对抗现金充裕的拜登。在宾夕法尼亚州，拜登在九月中旬至十月初花了 1700 万美元，而特朗普只花了 700 万美元。民主党外部团体在此基础上又投入了 1400 万美元，共和党团体则投入了 800 万美元；在佛罗里达州，特朗普正在进行他最大的电视支出，但他仍然落后，九月中旬至十月初，他花了 1700 万美元，而拜登花了 2000 万美元。

特朗普广告投入落后的问题源于他的筹款困境。8 月底，拜登可以花的钱比特朗普多，这在 2020 年大选期间还是第一次。拜登当时以 3.65 亿美元打破了筹款纪录，比特朗普的筹款总额多出 1.5 亿美元。拜登 9 月的筹款总额更是超过 8 月。

“热情因素”或能助特朗普连任

《纽约邮报》网站 10 月 10 日载文称，民众对特朗普展现出的热情数月以来不断增加，并在特朗普感染新冠肺炎后达到了新高，这有可能帮助他成功连任。

“大数据民调”（Big Data Poll）的负责人理查德·巴里斯（Richard Baris）称，支持特朗普的选民们对他的热情“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支持拜登的选民对拜登的热情水平处于历史低点，民主党有再次遭遇 2016 年情况的风险。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项民调显示，支持特朗普的选民中，“强烈支持”他的选民占 66%，而在支持拜登的选民中，该比例为 46%。

巴里斯称，当选民们对其偏好的候选人投票热情高涨时，他们往往会更可靠地投票，而且投票率很高。根据本月公布的几项全国性民调，在整个 2020 年大选周期中，特朗普票仓的热情一直都比拜登的更高。此外，现任总统也具有额外的“热情优势”，选民们通常会出来捍卫总统。

尽管如此，仍有一部分特朗普支持者在暗处。田纳西大学法律教授格伦·雷诺兹（Glenn Reynolds）表示，在特朗普时代，一些社会压力使很多支持特朗普的人不愿表现出对他的支持。

皮尤分析美国选民在种族和族裔结构上的变化

随着 2020 年美国大选日益临近，美国选民的种族和族裔结构变化再次引起关注。过去二十年来，非西班牙语白人选民人数下降，而非白人选民人数大幅增加。

皮尤研究中心网站近期载文，分析了美国选民的种族和族裔

结构变化。文章摘要如下：

美国近几十年来的的人口结构变化正在重塑其选民构成。了解关键州的种族和族裔构成变化，有助于为了解政治风向如何随时间变化提供一定线索。

皮尤研究中心二十多年来的调查数据显示，民主党在黑人、西语裔和亚裔注册选民中保持着广泛和长期的优势。过去十年来，白人选民对两党的态度总体上保持平衡，共和党略占优势。

但这些种族和族裔群体不是铁板一块，这些群体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观点，有时也会因原籍国而有所差异。例如，皮尤研究中心 2018 年针对拉美裔的调查发现，在忽略登记选民身份的情况下，波多黎各裔（65%）和墨西哥裔（59%）的西语裔合格选民比古巴裔（37%）选民更有可能认为自己是民主党人。在亚裔注册选民中，与其他亚裔选民相比，越南裔选民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共和党人，而印度裔选民则相反，他们更倾向于支持民主党。

上述不同群体在各州人口中所占比例将影响该州选民的党派倾向。例如，在佛罗里达州，倾向共和党的古巴裔历来是该州最大的西语裔群体，但过去十年里，更倾向于民主党的波多黎各裔已经成为该州增长最快的西语裔群体，且现在他们在规模上已经可以与古巴裔匹敌。与此同时，在加州和内华达州等州，倾向于支持民主党的墨西哥裔成为了主要的西语裔群体。

不过，在投票模式方面，党派划分不能说明问题的全貌。选民投票率在不同种族和族裔之间也存在很大差异。历史上，白人成年人的投票率最高，黑人成年人的投票率也相对较高，相比之下，亚裔和西语裔成年人的投票率则较低，只有一半的人表示他们在 2016 年参加了投票。

非白人选民在推动美国选民人数增长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2000 至 2018 年，全美合格选民人数从 1.934 亿增至 2.337 亿，

共增加 4030 万人。西语裔、黑人、亚裔或其他种族选民占据这一增长的四分之三以上（76%），这主要是由在美国出生的移民子女以及那些入籍并获得投票资格的移民所推动。

西语裔合格选民是全美选民人数上升的最大贡献者，占据了全美新增合格选民人数的 39%，其在 2020 年总统选举中首次成为美国合格选民中最大的少数族裔。亚裔合格选民的人数也大幅增加，从 2000 年的 460 万人增至 2018 年的 1030 万人。尽管合格非白人选民人数显著增加，但 2018 年非西语裔白人选民仍占美国选民的绝大多数（67%）。2000 至 2018 年，其增长率是所有种族中最低的，这导致其所占比例下降了近 10 个百分点。

在所有州都可以观察到，非西语裔白人合格选民人口整体下降。2000 至 2018 年，共有 10 个州的白人合格选民比例下降 10 个百分点或更多。在内华达州，白人选民占比在近二十年间下降了 18%，是所有 50 州中降幅最大的；加利福尼亚州白人选民占比也经历了类似的急剧下降，自 2000 年以来下降了 15%，导致加州从 2000 年白人选民占多数（60%）的州转变为 2018 年白人选民占比不足一半（45%）的州，尽管他们仍然是选民中的最大种族或族裔群体。

人口结构变化在一些关键“战场州”尤为值得注意，这些州的选民构成变化可能会对选举结果产生影响。在全国范围内，佛罗里达州和亚利桑那州的非西语裔白人合格选民比例下降幅度分别排第三和第四。另外四个“战场州”宾夕法尼亚、北卡罗来纳、威斯康星和密歇根在 2000 至 2018 年间也出现了白人合格选民比例下降的情况，不过降幅较小。

在过去 20 年里，佛罗里达州一直是美国历届总统获胜的关键州。自 2000 年以来，佛州白人选民占比下降了 13%，拉美裔选民则增加了 9%，黑人选民增加 2%，亚裔选民增加 1%。在亚利

桑那州，其选民的种族和族裔构成已发生了重大变化。西语裔成年人如今约占该州所有合格选民的四分之一（24%），自 2000 年以来增加了 8 个百分点。

有几个摇摆州选民构成变化较小，仍具有潜在意义。2000 至 2018 年，宾夕法尼亚州的白人选民比例下降了 7%，西语裔选民上升了 3%；在特朗普以及之前奥巴马、小布什和克林顿胜选的北卡罗来纳州，白人选民占比从 2000 年的 75% 降至 2018 年的 69%，西语裔选民占比升至 4%，黑人选民占比升至 22%。

虽然得克萨斯州目前并不被认为是“战场州”，但人口结构的变化让一些人认为，该州今后可能会在政治上竞争更激烈。2018 年，该州 30% 的合格选民是西语裔，较 2000 年增加了 8%。与此同时，白人选民占比下降 12%，从 2000 年的 62% 降至 2018 年的 51%。

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编辑部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编辑部：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邮编：200020

电话：021-33665148

工作邮箱：bianjibu@sias.org.cn